

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大学期间的阅读。哲理、激情，飞流直下、万马奔腾。彼时的张胜友，已经名满天下。

最早受到他的恩惠，是1998年。那一年，我30岁，还是一个懵懂青年，却仰望文坛高墙，决心以国内最火红的邯钢经验为背景，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处女作。但当我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并开始采访时，猛然听说他正在创作这个题材。而当时的他，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且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我胆怯了，决定退出，却又被告知合同神圣，不能毁约。在这本书的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时时想到他，想到面前有一座大山。

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我竭尽全力，写出了处女作《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从而幸得薄名。我走进文坛时，他已走上中国作协领导岗位，并负责报告文学方面的工作。

作为一名新人，我渴望认识他，便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总机转分机。

“您是张书记吗？”我战战兢兢，忐忑忐忑。

“哦。”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我简单地自我介绍，并表示了希望拜见的意思。

我尴尬地站立片刻，讪讪地退回原位。

此后几年，我仍然没有走近他，只是经常听他在台上高谈阔论，国内

悼胜友

□陈崎嵘

戊戌深秋之晨，惊闻挚友病逝。忆其叱咤风云之往事，思及精诚合作之情谊，不禁悲从中来，泣而为诗。

时序轮回本无忧，不意戊戌成悲秋。巨椽英名闻四海，文坛噩耗惊九州。纵横捭阖千里驹，鞠躬尽瘁孺子牛。天不假年徒奈何？江南北望泪难收！

岁月不饶人。眼睛花了，就很少玩手机看朋友圈了。11月6日中午接到短信，才获悉胜友先生离世的噩耗。那一刻，心突然一沉，那一朵爬山的云，真的飘走了吗？

说句实话，第一次记住张胜友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名出版家。大约在2001年前后，我刚刚进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那时是中国传统出版业的鼎盛时期，作为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是当时出版界的“大咖”。道听途说的有关他的改革和业绩，对于我们刚刚入门的文艺编辑来说，简直就是传奇。后来，有机会在某些会议场合，远远目睹到他的真容，那第一眼还真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他就是一个“个头不高、外表木讷、其貌不扬，被人们戏称为农民企业家、土老帽的人”。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丑男人”还有如此才情和魅力，而这些感受，后来我都写进了作品中，胜友先生也丝毫没有介意，不删一字。

因为工作，也因为创作，我对胜友先生的了解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进步。尽管不曾相识，更未相知，但对他的文学创作也逐渐对上了号，才发现早年曾经阅读过的《历史沉思录》《世界大串联》等报告文学作品竟然都是先生的手笔。至今我的书架上还摆放着他与刘茵、李炳银等共同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三卷本），曾经被军校同学索要之后，我不得不从旧书网上再次购买一套，几经搬家也没丢掉。

2014年11月，我在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作为前辈，胜友先生来给我们授课，评点同学的作品。作为党支部书记，我有幸与胜友先生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彼此留下手机号码，添加了微信好友。然而最多也只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点个赞，发发表情问好而已。因为眼花，我几乎没有看过朋友圈，也就没有与他主动联系过。大概是在2015年夏天，我忽然收到胜友先生发来的一个微信链接。打开一看，是《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条消息，内容是邓小平关注胜友先生撰写的政论片《十年潮》的故事。我看了，很为震惊，没想到一个作家的作品竟然引起了小平同志如此的重视。随后，就回复胜友先生一条短信，建议他自己把这段故事写出来。谁知，他竟然回复我说：“晓平，你来写。”说句实话，这确实令我有些措手不及，骑虎难下。我思考再三，只能应承下来。因为这些年一直从事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对胜友先生撰写《十年潮》受到中央高层关注的这段往事也确实感到有些兴趣。于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乘地铁6号线转14号线，很快就找到了他位于北京望京小区的家。让我感动的是，他亲自下楼来迎接。谈笑间，他稚气可爱的小女儿雅婷在楼道间嬉笑顽皮地奔跑。随后，我们在他的书房开始了访谈。谈故乡，谈高考，

瞧！那一朵爬山的云

□丁晓平

丁晓平

谈农村，谈城市，谈文学，谈出版，谈改革，谈人生，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故作高深。在袅袅的烟雾中，他回忆自己坎坷却又幸运、曲折却又成功的人生。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有丰富写作和采访经验的他，更懂得我提问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因此他的回答和讲述总是不偏不倚，没有废话闲扯，或直截了当闲庭信步，或开怀大笑酣畅淋漓。不经意间，他也发出了深沉地感叹：“写作就像爬山一样。”事后，我又得知，他的名字是其父亲取自《滕王阁序》中的“十旬休暇，胜友如云”。那一瞬间，“爬山”与“云”这两个互不相干的意象，在我的脑海中不期而遇。“一朵爬山的云”，就这样诞生了。或许，这就叫灵感吧？

两个多小时访谈结束后，我们握手而别。没有客套，甚至连一顿饭也没有吃。回来后，我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中篇传记文学《一朵爬山的云》。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请他斧正。没想到，他阅读后当即打来电话，对我的作品赞赏有加。他甚至告诉我，这篇作品，让他看到了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希望。我能想象得出，在电话的那一端，他喜形于色的表情。那一刻，我心中石头落地，如释重负，得到前辈的认可，当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而他从此也开始关注和阅读我的一些作品。

后来，他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与其他作家谈话时，都对我的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给予积极评价。

2016年2月，《一朵爬山的云》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在圈内引起反响。有评论认为，作品发现了笔下人物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智慧，从而写出了一个“看起来木讷”其实挺机灵的、“看起来挺随和”其实相当坚持的“真实的张胜友”与“富于立体感的张胜友”，写出了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可谓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历史见证。大概是这年5月间，我接到了胜友先生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中宣部一位领导在中国作协机关干部集训班做辅导报告时，忽然脱稿谈了阅读《一朵爬山的云》的感受。坐在台下的胜友先生，自然感到激动和光荣。他在第一时间把这种激动和光荣与我一起分享，足见他的爽朗和可爱。后来，他特意把《一朵爬山的云》作为附录，收入了《张胜友评传》。

与胜友先生第三次见面，是在2017年1月间。因为有了《一朵爬山的云》的情义，他推荐我去写中组部“两学一做”学习活动的树立的重大典型、后来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张进。我们一起飞往重庆，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身患重病。作为晚辈，看着他有些浮肿和发红的脸庞，我提醒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却谈笑风生，对战胜病魔信心满满。我在重庆停留一周完成采访。创作期间惊闻胜友先生昏迷住院，但却无法前往探视。随后，我顺利地完成了《铁汉丹心》的写作，《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部分章节，单行本图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胜友先生苏醒并顺利出院后，我曾致电慰问。而

副刊

会上，他又出席了，还是那么谈笑风生，言辞铿锵，只是虚胖一些。他毫不避讳地说起自己的病情，鬼门关太拥挤，资历不够，被阎王遣返原籍，又自己的生命密码已经重组。大家纷纷鼓掌，庆幸他的新生。我也发去一条短信：大难已过，必有寿福！

几个月前，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我虽然申报，却因曾经获奖，便无奢望。结果出来，榜上有名。最让我意外的是，本届报告文学的评委会主任，居然又是他——退休多年且身患绝症的他！

颁奖之后的一天，我打去电话，表示要当面致谢。他婉言拒绝，说明天早晨去协和医院输液，午餐时才能回来。我便坚决地恳请，您有病恙，更需探望啊。

他犹豫一下，终于发来了家庭住址。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我结结实实地买了两大捧鲜花，赶往张府。虽然已是秋风萧索，我要送他百花盛开、满室芳香。

但是，找到家门，再三按铃，却无人应答。我不敢打电话，静静地伫立。一个半小时，仍不见人还，只好把鲜花摆放在门口，怅然而归。

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收到他的微信。原来是医生留置，深度复查。

我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却又马上否定自己。以他的年龄和性情，加上优异的医疗条件，肯定能够渡过难关。

最近一个月，我多在南方采访，不忍联系，却一直在心底为他祈祷。

殊不知，2018年11月6日晨，突遭噩耗。

整个早晨和上午，我恍然无语，茶饭不思。看着天上一片片鱼鳞状的黑色云团，默默西去，不觉四肢如铅，泪流满面。我按照老家吊唁长辈的规矩，向北而跪，长哭以祭。

红尘弥漫，人生苦短，什么是情，什么是缘。

道德文章，世所罕见，星辰永恒，斯人云远。

呜呼哀哉，恩师安眠！



他却在电话中，对我的采访与写作给予了赞赏。但因生活和工作的匆匆忙忙，我终究没有登门看望他。2018年年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年会上，我坐在台下和许多朋友们一起，听他轻松幽默地讲述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引得满堂喝彩和愉悦的笑声、掌声。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会场上，我们也只是匆匆地握手寒暄，连一声道别都没有。

9月26日上午，我的手机“咕咚”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胜友先生发来的一个链接。原来，这一天《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新作《大海的召唤——厦门自贸区巡礼》。这是他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创作的。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在康复阶段的他，依然笔耕不辍，写出这种激情澎湃的作品，让我佩服的同时，也心生一些脆弱的担心和惴惴的不安，难道他真的是拼命三郎不要命了吗？我在给他发了一个敬礼的点赞表情之外，再也没有说什么，心中徘徊的只有轻轻的小小的祝福，希望他健康平安。然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如今，斯人已去，我与胜友先生短暂的交往，在若即若离、若实若虚、若有若无之间，或许才体味或抵达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境界。

岁月不饶人。瞧！那一朵爬山的云还在那里，在文学的天空上，轻轻地、淡淡地，飘呀飘……

副刊

10月29日凌晨，李希凡老师溘然长逝。他的突然离世，让人措手不及。因为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筹划着下一周与李老的见面，想放松聚聊一次，也向李老汇报计划中的《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进展工作。我们印象中的李老，精神矍铄，虽是90多岁高龄，依然脑力健旺、思维清晰，时时刻刻念着红学事业，《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是他一直关心的事。

他逝世的不幸消息让我难以抑制悲伤，时而眼眶润湿，不免落泪。以往接触、交往、座谈、聆听教诲的情景历历在目，恍然如昨，令人挥之不去。他总是将他最新的著作签上名赐我一份，他总是以谈学为主兼及生活安排，他总是问学界最近有什么新发展，他总是问我们还应该做什么科研项目，以推动学术事业的提升等等。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获得他的鞭策与鼓励了。

2013年上半年，我曾经到家采访过李希凡老师。间的话题事关1954年他红学批评的起步之作，话题有些老，但他依然耐心地回忆并讲述了当时客观的历史契机和真实的批评意图。这些话题虽然老早就是历史的聚焦之点，但是却不断有新内容。比如有些怀疑者总是以窃斧之疑看待这次重大历史事件，认为暗地里必然有未曾揭秘的幕后交易，不能当作是一场文学批评来看。他们认为李希凡没有将全部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其中隐藏着关键环节。初出茅庐的学生，由于向名人发起了不妥协的学术批评，而受到毛泽东支持，因此一夜成名天下知。有的人不相信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写出引起重大历史思想冲突的文章，刻意求深地认为还有其他玄机。其实，了解李希凡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人生追求的话，就不难看出历史偶然中的必然。他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学习，做了大量的笔记，一直尝试着将其作为方法论来展开思想辩论，加上自小对古典名著的喜欢，以及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对文艺理论课的痴迷，使得他成为脱颖而出的时代宠儿。那个天翻地覆、改天换地的时代，有许多话题要变，有许多思想要变，有许多思潮要变，有许多文化、学术人物要变，甚至包括文体文风，包括提问方式、写作习惯等。创新中有继承，而这次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对旧有学术范式、话语主题、文风的反叛。历史的事关人，后来都意识到了这场以思想批判为名的思想变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在后来的历史聚会中，俞平伯和李希凡的见面，心中毫无芥蒂和障碍，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都没有将此看作是意气之争，宗派之争，分歧就是已经表明的立场与态度，没有皮里春秋的虚虚实实，因此也不需要转化成为个人之间的恩怨。谈到这段历史，李老显得坦然而自信，他说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不需要虚构什么，至于有些人说我虚构了向《文艺报》问询可否发表批评俞平伯文章的细节，实在是不懂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十分活跃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说到这儿，李老再次对山东大学的《文史哲》表示深深的敬意，对当时的主编和编委表示感谢。他们不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且还是第一次将在校学生的学习报告发表出来，也是创了该杂志的一个新纪录。李老回忆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本是一篇学习笔记，是文艺学吕荧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被吕荧老师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了，这也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自然是一件新鲜事。说起来，后来引起毛泽东同志关注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并不是李希凡充满锐气的第一篇文章。

我曾经为1954年那次红学论争写过文章，不是为李老辩诬，因为李老不需要辩诬，那段历史也不需要辩诬。他一直光明磊落，一直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是以一个普通文艺批评者的身份来进行着心目中崇高的文学事业，没有政治投机的任何算计、任何得失计较。李希凡老师一以贯之地坚持着自己的批评方法，对于20世纪历次参加的批评活动，依然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对个性的锋芒，在对于以往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中也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认为回顾20世纪我国文学批评的历史风云，不要过多地去揣测背后的所谓“个人恩怨”和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特别

是对人物做评价时，有些人刻意去拨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绪，从细节上去捕风捉影，没有大历史的观念，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失实和扭曲。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理论立场的差异与对立，以及对历史、现实的不同态度等。

2015年我的《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将要出版，我找李老为我写序，李老欣然应允。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他不是一位随便给人顺水人情的人，而是郑重其事地谈起我的写作，李老说我的论文是“评多论少”，撰文、论争、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立论，最终应该形成自己的全新系统见解和理论观点。1954年李老已经蜚声文坛，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人生榜样，现在叫偶像，而11年后1965年才出生的我，居然能够得到李希凡老师的墨宝，心中自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激动。除此之外，当时已经80多岁的李老在认真地阅读过我这位小他38岁的学生的幼稚论文之后，提出这样中肯、恳切的批评和高标准的要求，令我感动，又感觉冒昧和汗颜。

探索李老的精神世界，不理解毛泽东在李希凡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法理解李希凡的。他受到了历史伟

人刻意去拨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绪，从细节上去捕风捉影，没有大历史的观念，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失实和扭曲。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观点之间理论立场的差异与对立，以及对历史、现实的不同态度等。

2015年我的《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将要出版，我找李老为我写序，李老欣然应允。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他不是一位随便给人顺水人情的人，而是郑重其事地谈起我的写作，李老说我的论文是“评多论少”，撰文、论争、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立论，最终应该形成自己的全新系统见解和理论观点。1954年李老已经蜚声文坛，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人生榜样，现在叫偶像，而11年

□孙伟科

怀念李希凡老师

后1965年才出生的我，居然能够得到李希凡老师的墨宝，心中自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激动。除此之外，当时已经80多岁的李老在认真地阅读过我这位小他38岁的学生的幼稚论文之后，提出这样中肯、恳切的批评和高标准的要求，令我感动，又感觉冒昧和汗颜。

探索李老的精神世界，不理解毛泽东在李希凡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法理解李希凡的。他受到了历史伟人格感召，借助于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细致研读，深悟民族的复兴诉求与人民的愿望和追求，自觉将个人的奋斗与伟大的历史进程相融合，这使得毛泽东和这个“小人物”发生了许多间接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几次关于文学以及涉及李希凡的谈话，既是鼓励也是教诲，几个回合之后，也是深深地反思之后，他默然领受了领袖对他的要求，立志终生做一个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立场的文艺战士，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展开以求真求美为目的的无私无畏的批评。李老回顾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尽管风云变幻，有时也有唐突和冒失，但人生无悔，并对自己敢于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而自豪。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没有论争就没有学术进步。说起当前的红学研究，李老认为，近几十年无论作品思想艺术的深入探讨，作家身世和版本研究的发掘和考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同样有回潮和灾害，如某些强势媒体和背后商业利润所驱使的“揭秘”“群殴”某人。这是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种透支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

李老生前，红学界的老朋友每到年底或第二年初都会聚会一次，话题是《红楼梦》，气氛总是欢快和愉悦的。聚餐结束，李老总是让自己家人抢着付账，他说，和大家相聚我很高兴，再说我的退休工资比你们都高呀！李老在我们眼中是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既是毛泽东所说的“小人物”，又是心底无私、襟怀宽广的大人物，但他把自己当成是我们红学会中普通一员。201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换届选举，李老坚辞学会名誉会长，是因为当时会场全体代表的掌声挽留，他才无奈地领命受委。当然，在和李老交往中，绝不是只有轻松的聚会，还有嘱托。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印象中，经常在周五，或者两周一次，甚至一周一次，李老总是给我打电话询问红楼梦研究所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不能忘记，李老总是说，红楼梦研究所是做事物的研究单位，要做大事情，以前完成《红楼梦》新校本和《红楼梦大辞典》，是两项大工程，今后还要做有重大影响、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即使是当前，也要加紧对《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新校本的重新修订工作。要满足时代需要，要修正错误，精益求精，要与时俱进，要将更多学者的真知灼见吸收进来，使之与文学经典的地位相称。李老的话，我都真切记得，每一次都是他老人家主动打来，这更让我感到言之谆谆、意之殷殷的托付之重。

11月4日是李老八宝山遗体告别的日子，阴雨霏霏的天气，天幕低垂，大地凝重，近千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告别大厅肃穆庄严，鲜花丛中，李老安详地躺着，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面色一如生前一样洁净明亮，犹如安然睡去。

李希凡先生千古！